記憶的權力——殖民時代下澳門雕塑

The Power of Memory—Sculptures of Macau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霍凱盛 | Eric Fok-Hoi Seng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藝術工作者

M.F.A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Artist

來稿日期：2024年10月20日

通過日期：2025年5月7日

摘　要

在兩岸四地中澳門常被忽略，其相關的書寫記錄亦相對較少，本文嘗試透過殖民時代下澳門雕塑紀念物的分析，探討澳門在中國與葡萄牙兩國的文化共存與分治權力下，對地方記憶的影響及反思。

地方是社會所建構，凝聚了人類歷史以及記憶並界定了文化與認同，是社會鬥爭下的政治結果，文章透過紀念物的書寫嘗試拼湊出更多面向的記憶。60 年代澳門的發生的「一二．三事件」，豎立在議事亭前地的美士堅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1818-1880）雕塑在反殖民抗爭運動中遭示威者拉倒，殖民者塑造的民族英雄倒下彷彿連同權力與帝國記憶一同被摧毀；文章提到的另一件雕塑亞馬留總督（J.M. Ferreira do Amaral）（1803-1849）於 40 年代從里斯本運到澳門並舉行盛大揭幕，最後卻在落寞下回到葡萄牙。葡方以正面描述爲民族英雄，相反中方則認爲是殖民侵略的象徵，需要遺忘的地方羞恥記憶。澳門是亞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從殖民管治、世界冷戰到 1999 年政權移交中國，爲歐洲殖民主義在亞洲寫上句號，多年來政治分裂的歷史如何形塑出今天的澳門社會，本文嘗試從歷史文獻資料的解讀及實地考察，溯源澳門文化認同的形成，並爲其多面性的歷史記憶進行書寫記錄，反思本土文化特質及其身份，並從經驗中獲得啓示學習。

關鍵詞：澳門、殖民雕塑、葡萄牙、地方記憶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Macau is often overlooked, and the related writings are relatively scar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reflection of Macau's 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divided governance under China and Portugal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olonial-era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Place is constructed by society, encapsulating human history and memory while defining culture and identity. It is a political outcome of social struggles. The article seeks to piece together multifaceted memories through the writings on these monuments. The "1-2-3 Incident" in Macau during the 1960s saw the statue of 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 (1818-1880), erected in the Praça do Senado, toppled by demonstrators as part of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The fall of this colonial-era national hero symbolically destroyed not only the figure itself but also the power and imperial memory associated with it. another statue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is that of Governor J.M. Ferreira do Amaral (1803-1849), which was transported from Lisbon to Macau in the 1940s and unveiled with great fanfare, only to eventually return to Portugal in solitude. The Portuguese narrative presents him as a national hero, while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views him as a symbol of colonial aggression, representing a shameful memory that needs to be forgotten. Macau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lonies in Asia, and from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the Cold War to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to China in 1999, it marked the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in

As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e formation of Macau's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documenting its multifaceted historical memories. It reflects on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ty,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se experiences.

Keywords: Macau, Colonial Sculptures, Portugal, Local Memory

一、19 世紀澳門的葡萄牙化與亞馬留總督

發生在大航海時代的殖民主義，意指土地遭由外來民族實質佔據並進行開發，除了與過往的土地掠奪和實質佔領外，更賦予了資本主義與科學的知識系統，這種知識系統受到歐洲啓蒙運動影響，著重理性與知識，爲日後殖民者對新屬民及新領土有更充分的理解以便管治，從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權力／知識」兩者的相互關係，以及運用在殖民治理上的重要性，主張權力需要通過制度與實踐來彰顯，而知識卻有助創造制度，殖民者運用科學知識理解世界，認爲西方是唯一的認識方式，在地理知識上，[1] 將空間數學化有助更好地運用土地資源、控制社會的生產以及徵稅。知識在歷史書寫上讓西方成爲歷史的主體，屬民則爲客體，被殖民者無法拒絕被書寫，亦無法發聲表達眞正的自我，殖民者透過建立紀念物以培養共同價值觀及信仰，目的凝聚民眾以培養地方感並鞏固其殖民管治，讓屬民加以內化以改造其身份認同。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曾提出「知識暴力」指西方不論在宗教、科學、哲學、建築或管治等領域都以西方的知識再現他者，被他人所詮釋。[2] 殖民主義在知識與權力的基礎下迅速擴張，知識的權力書寫了地方歷史，歷史敘述卻在權力關係變化中發生變更。

新帝國主義盛行於在 19 世紀，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生產力得到大幅提升，同時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帝國對原來貿易港或通商口岸

1 Joanne P. Sharp 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理學》（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12），頁 153。

2 Joanne P. Sharp 著，《後殖民地理學》，頁 153。

進行全面殖民管治。葡萄牙人來澳將近 500 年歷史，16 世紀中葉明朝政府在澳門實施唐宋時期沿用的商港蕃坊形式，讓葡萄牙人在澳門進行區域自治，爲遠洋船隻提供維修補給及等待季風回航等用途。直到 19 世紀治理形式才有所改變，葡萄牙人對澳門實行全面殖民管治，在領土拓展過程中更曾發生轟動國際的事件，時任澳門總督被刺殺並斬首，導致葡萄牙軍隊與清朝軍隊爆發軍事衝突，英、法、美多國軍艦結集於澳門戒備，事件進一步使清朝走向夕陽的歷史終局。

鴉片戰爭後香港開埠，清政府的衰落及軍事弱勢被西方列強所揭示，葡萄牙王朝在結束內戰十年後，於 1844 年由葡萄牙瑪莉亞二世女王（Maria II de Portugal）（1819-1853）宣佈澳門爲海外省政府，擺脫隸屬於印度總督，隨後於 1846 任命亞馬留爲澳門第 79 仕總督，他仿效英國把澳門成爲殖民地，在獲得英國海軍的支持下，取消並驅逐清朝在澳門的關部行臺及稅館等海關機構，往北拓展澳門管轄範圍期間，更損毀沿路華人的墓地，在過急與強硬的殖民措施下，於同年 8 月 22 日總督在蓮峰廟附近騎馬郊遊時，遭數名華人攔截刺殺。據兩港總督徐廣縉奏報西洋兵頭折載：

> 七月初五，聽聞土夷傳說，啞嗎嘞說下午去關閘門跑馬遊玩，帶人無多…該犯夾著雨傘，將尖刀都藏在傘內，假裝夷人告狀模樣，聲喊伸冤，啞嗎嘞伸手來接呈詞，遂拔刀欲斷他臂膊，滾下馬來，即砍取首級級並臂膊，一同逃去。[3]

3 何志輝，〈明清時代澳門的中葡共治研究〉（博士論文，關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科，2014），頁 299-302。

事後因廣州城內出現懸賞總督首級的告示，澳葡政府認定兇手與清朝有關，向兩廣總督提出嚴正交涉，要求 24 小時內緝拿兇手並歸還總督首級及手膊。隔天，剛開埠的香港第三任港督文咸（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見狀派出兩艘軍艦前往澳門，透過支持葡方並藉此擴大英方勢力，葡英政府更協議計劃佔領廣州以報復清朝，但最終並沒有實行，美國與法國公使亦就事件表態支持葡萄牙，向兩廣總督提出抗議。清朝兩廣總督就局勢調動大批士兵前往香山縣澳門附近砲臺結集，同時向澳門關閘進行炮轟，雙方局勢迅速升級，澳葡當局在美士基打上校（又稱美副將）率領數十名軍人前往關閘，局勢緊張下清兵見狀撤退，而香山縣丞汪政亦乘橋逃離，炮戰中導致清軍潰敗四散，共陣亡百多人並有多人受傷，葡軍僅有一人受傷，葡萄牙軍隊在戰死的清兵中斬去其手臂及首給頭顱，並帶返澳門遊街示眾，以報復日前被刺殺的澳督。[4] 炮戰後美國、英國、法國與西班牙共調派數艘船隻前往澳門及附近水域協助防禦，數月後清朝逮捕數名兇手更將其中一人被處死，兩方經過多次交涉後，最終清政府將亞馬留的頭顱及手臂交給葡方。在 19 世紀新帝國主義擴張的背景下，澳門總督亞馬留遇刺到演變成清朝與葡萄牙的軍事衝突，最終迫使清政府簽署《中葡北京條約》[5]，使澳門成爲兩個帝國博弈的場域，該事件爲葡方塑造了民族英雄，成爲日後殖民政府值得提起的榮耀歷史。

4 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 著，楊立民、王燕平譯，《葡中接觸五百年》（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基金會，1999），頁 124-125。

5 黎熙元，〈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92 期（2005.12），頁 19。

（一）殖民衝突與英雄紀念

亞馬留事件發生在鴉片戰爭後，清廷與西方列強間關係急速改變，積弱的國力被揭示於西方，對近代中國產生深遠影響。國內知識分子開始認識西方並向其學習，日後更推展對中國近代影響深遠的「洋務運動」。葡萄牙在澳門從過去蕃坊的管治擴大權力至實行全面殖民管治，清朝在澳門的主權遭到削弱。20 世紀 30 年代葡萄牙新政府（Estado Novo）總理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9）頒布新國家憲法，文化政策上規定於海外領土及殖民地推行具國族歷史的一系列政策，[6] 葡萄牙政府在澳門市中心爲亞馬留總督以及美士基打上校豎立紀念雕塑，兩人被葡萄牙譽爲民族英雄，爲葡萄牙管治者建立神話化的歷史英雄形象，宗主國面對遙遠的殖民地以及不同民族的背景下，透過現代民族主義雕塑喚起昔日帝國集體的歷史記憶，藉此建立歸屬感以達凝聚民眾及鞏固政權統治，新政策期間雕塑紀念物得到大量興建，[7] 例如里斯本的〈發現者紀念碑〉、葡屬果阿〈阿方索銅像〉，後者於 1961 年果阿危機中遭到拆除，作品中大部分以戰爭紀念爲主題，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尤其在亞洲殖民地上更具政治意涵，紀念物發揮在殖民地傳播思想功能，旨在於殖民地空間進行民族化，且滲透於日常生活的精神政治，將城市成爲權力和國家標籤的景觀。

6 Maira Adelaide Miranda 著，陳用儀、姚越秀譯，《葡萄牙美術史》（北京市：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頁 142。

7 Ana Lourenço Pinto, “The Portuguese Neo-Baroque Sculpture: state of the art,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adernos de Arte Pública* 2, no.1 (2014) : pp. 24-35.

在 1940 年 6 月 24 日剛成立 7 年的葡萄牙第二共和國政府，正值葡萄牙雙慶年，分別是 1140 年擺脫卡斯提亞王國獨立；及 1640 年葡萄牙結束與西班牙的伊比利亞聯盟後復闢，新政府藉著國家慶典證明新政權延續的合理性，於在澳門南灣（現今葡京娛樂場前）與議事亭前地建立亞馬留（圖 1）和美士基打雕塑，亞馬留是唯一被制作成雕塑紀念的澳督，雕塑連基座總高度爲 15 米，其中青銅部分高 4.5 米，基座矗立於圓角正方形平臺上，由 4 條樓梯通往，共 4 支石製圓柱組成，下方刻有亞馬留的生平事蹟，兩側刻有葡萄牙王朝的紋章；寫實主義雕塑造型還原當時總督在馬上遇襲時，拿起揮鞭奮力抵抗的場面，雕塑曾在反殖民的「一二．三事件」中被示威者嘗試摧毀，但由於基座較牢固以至未能成功拉倒，[8] 在 80 年代澳門政權移交談判的《中葡聯合聲明》上，亞馬留銅像移除更成爲中方第一批的要求，1989 年 9 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魯平（1927-2015）訪問澳門時指澳門回歸後不容許存在葡萄牙殖民主義象徵物，在中方立場澳門問題不僅是澳門問題本身，還包括香港以及臺灣問題，是相互影響的整體，談判期間時任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1927-2020）就公開指責中方在澳門回歸過渡期間，對僅屬澳門事務問題不節制地發表意見令人擔憂，更具體指出在臺灣設立澳門旅遊經濟辦事處以及亞馬留銅像等問題，但關於亞馬留銅像折遷的決定，文禮治稱葡方早在中方要求前一年半前已有計劃拆

8 Mourao Alda, "O Governador Ferreira do Amaral e Zhiliang Uma reflexão sobre heróis criados em Macau, a partir de experiência pedagógica com alunos chineses," *Orientes do Português*, no.3 (2021) : pp.81-103.

遷雕塑，[9] 最終在 1992 年被運回葡萄牙於次年安放在里斯本機場附近的 Bairro da Encarnacao 社區花園（圖 2）。

另一件雕塑於雙慶年紀念日同日落成，是亞馬留總督被刺殺事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美士基打上校，在 1849 年 8 月 25 日拉塔石砲臺之戰（又稱 1849 年關閘事件）他組織軍事小隊前往澳門邊境的關閘與清朝軍隊作戰並獲勝，事件令清朝在澳門主權遭到削弱，社會變得更葡萄牙化。美士基打的軍事行動解救了面臨地緣政治危機的澳葡政府，事後由副中尉獲晉級成爲中尉，葡萄牙在 1871 年關閘建成的凱旋門式拱門，在石碑上刻有事件的重要日期作紀念，包括刻總督遇刺日期「22 AGOSTO 1849」及美士基打出兵關閘日期「25 AGOSTO 1849」，拱門上方寫上著名葡萄牙詩人賈梅士的詩句「A PÁTRIA HONRAI QUE A PÁTRIA VOS CONTEMPLA」（祖國永遠懷念爲她爭光的人）（圖 3），除了爲兩人設立雕塑紀念外，拓展土地的街道更以兩人名字命名，當權者希望藉著紀念物來創造浪漫的英雄神話，並凝聚民眾認同政權的合理性，最終兩座雕塑在意識形態的矛盾及國家權力較量下，只停留澳門 26 年及 52 年後分別被運回葡萄牙。殖民者管治與知識權力的結合，透過權力景觀的建立增加屬民的文化認同及凝聚歸屬感，帝國的宣傳注入居民日常生活，紀念物成爲權力和帝國的景觀的載體，同時卻受制於政治的角力，體現出當中歷史、文化、權力的複雜話語。

9 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 著，《葡中接觸五百年》，頁 122。

（二）美士基打的悲劇與平反

被葡萄牙譽爲浪漫民族英雄的美士基打上校，是當時遇害總督亞馬留的下屬，他出生於 1818 年澳門的土生葡人，父親爲律師，17 歲時加入軍隊，在關閘事件後晉升爲中尉並在 1873 年晉升爲上校，曾經擔任大砲臺、聖地牙哥砲臺及氹仔砲臺司令，更出任政府委員會以及軍事司法委員會委員，更多次獲得授勳。雖然仕途順利但由於海外殖民地土生葡人的身份，令他未能獲得公平晉升機會，使他情緒備受打擊更導致精神異常，這位獲葡萄牙稱讚爲澳門英勇的保衛者的上校卻在悲劇下終告一生，於 1880 年 3 月 27 日的《澳門與帝汶省政府憲報》：

> 拉塔石砲臺的勇士美士堅打退役陸軍上校，因精神錯亂而幾乎將全家成員殺害，後又跳入其住宅一口井內自殺身亡。[10]

美士基打在自殺當晚受精神影響下殺害了其妻子及女兒，更重傷其子，最終在亞婆井投井自殺結束其傳奇的一生，由於 19 世紀並未有太多關於精神疾病的醫學研究，當時澳門總督以該軍官干犯滔天罪行，軍事榮譽並不會授予殺害妻子和孩子的兇手，取消軍人葬禮同時，澳門市議會亦拒絕爲美士基打舉行天主教葬禮。在數十年後，美士基打的功績終於獲得平反肯定，重新以軍人葬禮將遺體遷往聖味基墳場，並以「美副將大馬路」命名街道作紀念，在 1940 年於澳門市政廳前樹立雕塑。

---

10 Beatriz Basto da Silva 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 19 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頁 218。

〈亞馬留紀念銅像〉及〈美士基打銅像〉由葡國雕塑家馬阿爾維斯（Maximiliano Alves）（1888-1954）創作製作，他出生於首都里斯本，父親爲葡萄牙鑄幣廠的首席雕刻家，於 1911 年里斯本美術學院的雕塑課程畢業，作品擅長巴洛克風格，呈現誇張扭曲的肌肉組織，富戲劇性的姿勢。在新政府期間他多次受官方委託創作，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佛得角及澳門等多地留下不少雕塑作品，包括位於里斯本海洋博物館、聖本篤官、法蒂瑪玫瑰聖母神殿主祭壇頂部浮雕、阿爾維拉運河噴泉；華氏古達伽馬、曼努爾一世國王、阿方素等重要歷史人物雕塑，當中建於 1931 年在里斯本自由大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紀念碑（圖 4）是其代表作品，更爲他帶來基督勳章軍官軍銜的榮譽。

從開埠到政權移交中國數百多年間，澳門歷史的書寫由中葡兩國政府所共同建構，早期葡萄牙政府透過知識賦予權力，成爲歷史的主體並以自身的方式去理解世界，隨著政治權力的變更，出現反殖民的政治話語，對澳門歷史進行了另一種表述，而澳門人對自身歷史只能在兩者權力中，選擇他者爲其書寫的歷史，在缺乏本地人的敘述下本土歷史及文化認同出現斷裂，地方記憶失去延續性以及自身文化特徵的模糊淡化，筆者在後殖民時代重新審視歷史，嘗試找尋及重建自身的文化根源與身分認同。

二、殖民景觀的歷史記憶

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書寫歷史。歷史從現存的史料拼湊成客觀可信的歷史故事，對歷史有了更深刻的描述，歷史是

> 某部分人的記憶，為當權者對過去的描述，歷史成為了一種選擇。歷史的撰寫閱讀，讓人們更加瞭解自己，理解個人的獨特性，自己是什麼等。[11]
>
> 歷史學者柯林烏（R.G. Collingwood）（1889-1943）

記憶構成了族群或個人身份的要素，在社會權力競逐中扮演關鍵角色，「記憶」與「遺忘」始終是不同階層群體或個體中所關注的歷史議題，既曾主導、亦持續形塑社會的歷史進程，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將記憶的生產放於社會框架內，指出人類的記憶能力並非孤立存在，唯有在社會中人們才能辨識記憶，並對記憶進行定位。[12] 集體記憶並非單純地蒐集個體記憶，而是對記憶進行重新建構，從當下的視角出發，將過去重塑而成，那些被刻意遺忘或消失的歷史，正揭示了集體記憶背後隱含的權力操縱機制。在殖民景觀中，管治者透過紀念物的建造從而建構出歷史記憶，連結過去到現在，與現代國家排列成直線，將曾經疆土內的各族群文化合理地成爲現代國家的民族，國家自然成爲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國族主義建構了國家的過去，並爲現代國家服務，透過懷念召喚城市或帝國記憶，藉此增強帝國間的內部團結認同。記憶往往是紀念勝利者的歷史，同時具有選擇性，某些記憶獲得選擇宣揚，而另一些記憶卻被選擇遺忘，這些選取是政治的選擇並非記憶的問題，不同位置立場的人都爲歷史記憶進行

11 李孝智著，丘延亮編，《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7），頁 44-48。

12 Jacques Le Goff 著，方仁杰、倪復生譯，《歷史與記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7。

爭奪。[13] 20 世紀，在兩個共和國夾縫中的澳門，多次就雕塑紀念物的建造去留問題，出現分歧甚至產生政治風波，這些雕塑有的在殖民抗爭運動下被拉倒，有的在政權移交前被拆遷，再有的甚至遭炸毀，雕塑紀念物成爲在記憶政治以及地方政治鬥爭下的產物，藉著雕塑流離的故事，我們得以尋找城市過去被遺忘的歷史記憶，並從中思考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座落奧埃拉斯海邊的葡萄牙突擊隊協會（Associação de Comandos）花園中豎立著一尊美士基打上校銅像（圖 5），旁邊金屬牌上寫道：這座雕塑正面對天使聖名之城——澳門，距離此地 11011 公里。雕塑約高 2.6 米，身穿軍服眼神凝視著前方，造型以扭曲的身軀定格了軍人揮劍的瞬間，銅像座立在簡潔金屬版組合成的十字形底座，細看雕塑雙膝位置有明顯修復的間隙，鞋頭部分亦被切割，不難看出雕塑曾遭到破壞。84 年前，這尊雕塑本最初從葡萄牙運到澳門，安放於市中心的議事亭前地，並由總督爲此舉行盛大揭幕儀式，直至 1966 年澳門爆發大規模的反殖民騷亂「一二・三事件」，雕塑遭到示威者拉倒並掉進海中，作品逐漸消失於屬民的記憶中。記憶能喚起了歸屬感，凝聚族群並界定身份，然而那些記憶需要表揚，那些應該抹去都是具選擇性的，其背后由權力的機制所選擇。筆者於本年（2024）及 2016 年分別到訪葡萄牙找尋兩尊失落的澳門雕塑，嘗試從冷戰時代形成的新世界秩序中，探討權力政治對澳門社會的影響，藉著與土地的對話，建構地方與文化的身份認同，並透過集體記憶的書寫抵抗遺忘。

13 鄭培凱、李磷，《文化遺產與集體記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62-66。

（一）兩個共和國政權下的澳門

數世紀來，世界經歷西方殖民主義的過程，全球大部分土地曾被納入殖民體制，世界被劃分爲西方已知的安全世界，以及另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神秘尚待開發的非西方世界的二元地理概念，隨著後殖民世界的來臨，這種概念在冷戰背景下被新秩序所取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在上世紀 40 至 60 年代間全球去殖民化運動最爲盛行，後殖民世界從傳統帝國殖民主義下的二元地理，戰後再次分割爲三個世界，根據普萊奇（Carl E. Pletsch）（1943-）分析第一世界以美國爲首實行資本主義國家；第二世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國家試圖與前兩者不結盟，在 1955 年萬隆會議上「不結盟運動」，大部分國家嘗試以亞洲與非洲的經驗，實行第一及第二世界以外的社會秩序。自 1945 年聯合國成立之初由 41 個成員國組成，至 1975 年以倍數增加成 144 個成員國家，期間絕大部分的殖民地自主獨立成爲主權國家，在亞洲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越南、馬來西亞等，非洲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等國。在各種殖民管治中，各地管治方式形態不一，各時代各地的殖民地都有各自特徵。[14]

但傳統殖民帝國葡萄牙在戰後並沒有跟隨大部份國家實行去殖民化，並於 60、70 年代在非洲發生多場殖民地戰爭，在二戰結束後，美國的聯絡小組曾到澳門與澳葡政府討論澳門會否歸還中國，但遭到葡方拒絕，而當時葡萄牙的薩拉查政權嘗試在歷史的書寫中建立澳門管治的合理性。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時任葡萄牙總統薩拉

14 Joanne P. Sharp 著，《後殖民地理學》，頁 107-110。

查是殖民主義者並實行專制管治，主張澳門與中國內地維持睦鄰關係，他曾經表示在意識形態上，他擔心中國在民族主義下的兩個歐洲領土（澳門和香港），或許在反對白人的政治勢力下被奪主權，澳門的前途影響著葡萄牙與中國的兩國關係。

近代的澳門充當葡萄牙與中國的溝通橋樑，巧妙地處理著兩國的共同利益，發生在 1961 年印度的「果阿危機」葡萄牙透過澳門的華人領袖何賢（1908-1983）與中方周恩來（1898-1976）商議，嘗試透過中國在印度的影響下化解危機。在 1971 年以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仍然是中華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前，由於考慮澳門的因素，葡萄牙多次在中國加入聯合國投票上選擇棄權，最終在 1971 年 10 月葡萄牙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當時澳門華人僑領何賢以及崔樂其（1922-2006）充當北京聯絡人，向葡方轉達希望投票支持中國的意向。儘管中國成功進入聯合國後，立場依然堅持反對殖民主義，在非洲發生的反葡殖民戰爭期間，中國更爲莫桑比克、安哥拉、幾內亞等提供武器及軍事培訓，其中安哥拉的戰爭更成爲了冷戰下蘇聯、葡萄牙、美國、中國的角力。

直至 1974 年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後，新政府自願放棄其所有殖民地，包括澳門，但由於時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與葡萄牙未有正式外交關係，此外 60 年代澳門發生的反殖民運動「一二・三事件」後，中國及親共組織團體在澳門已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實際上甚至已經掌握行政事務，由於抗爭成功獲得中共政府的支持，故中共要求澳葡政府關閉國民黨及其相關機構，但當時葡萄牙與聯合國上的中國代表中華民國仍有邦交，因此產生一場外交風波，其後雙方更因此結束外交關係。儘管中葡兩國價值觀的不一，但雙方仍然希望維持良好關係，葡萄牙新政府在 1975 年仿效美國乒乓外交，派出足

球隊訪華，[15] 最終澳門於 21 世紀前的 1999 年 12 月 20 日政權移交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實施一國兩制，歷經近五百年的歐洲殖民主義在亞洲正式落幕。在近代二戰以後，澳門並未有跟隨世界的去殖民浪潮而擺脫殖民管治，卻始終遊走於葡萄牙與中國狹逢中，尤其在冷戰期間，兩國雖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分歧，當面對共同利益仍然保持合作，在複雜歷史背景下，澳門發揮了兩國溝通橋梁的作用，同時體現出國家利益下小城的政治妥協與應對。

（二）澳門「一二・三事件」的火紅年代

澳門在多年殖民管治下的社會壓迫，澳門華人僅發生數次的反殖民抗爭運動，其中以 1966 年爆發的「一二・三事件」最具象徵意義，事件是現代澳門政治經濟的分水嶺，對社會政治與民生經濟各方面產生深遠影響。上世紀中葉，澳門不僅處於葡萄牙的管治之下，還面臨國民政府與中共政府之間的政治較量。戰後的澳門經濟環境疲乏不振，澳葡政府的官僚主義效率低下、治理貪腐鬆散，本地華人遭遇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情況加劇，導致勞工階層並沒有得到政策保障，華人因此自發組織社團，並逐漸形成具有政治色彩的團體工會。事件發生時值 1966 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起初「一二・三事件」由長期積壓的種族主義及社會不公平所引發，後來演變成具文革色彩的國族主義運動，事件使澳門進入狂熱的火紅年代並持續數年，[16] 成千上萬民眾手執《毛語錄》高舉毛澤東肖像，

15 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 著，《葡中接觸五百年》，頁 149-156。

16 李孝智著，丘延亮編，《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頁 130-133。

唱著〈東方紅〉地舉行大會及遊行成爲澳門的日常（圖 6）。而事件更深刻地影響鄰近的香港，導致「六七暴動」的發生，儘管港澳的政治形態相近，但葡英兩國政府的處理手法和結果卻截然不同。港英政府最終平定暴動，在民生社會福利的殖民地政策上，對教育及肅貪作出改善，並有意培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凝聚社會之間各族群；另一方面，澳葡政府在事件中最後作出讓步，澳門總督嘉樂庇（Jose Nobre de Carvalvo）（1910-1989）簽署訴求答覆書並作出賠償，澳葡政府管治的合法性遭到全面質疑，事件過後中共政府藉此取替國民政府成爲澳門的華人政治勢力，並培養成立影子政府以直接及間接地控制澳門社會。[17]「一二．三事件」由最初反殖民管治，往後演變成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在左派勢力的支持下，不僅改變了澳門的政治權力結構，更深刻地形塑出了今天的澳門社會政治面貌。

（三）「一二．三事件」中被拉倒的「記憶」

在 1966 年 11 月的澳門，當時華人團體於離島氹仔籌辦坊眾學校，但相關工程手續一直未有獲批，校方最終在未獲批准下開始施工，隨後更演變成衝突，建築工人遭到警察暴力驅離，事件中多人受傷，導致華人與葡人族群間矛盾更爲激烈，衝突後校方向澳葡臨時護督施維納（Carlos Armando da Mota Cerveira）提出 5 項訴求以及要求會面，但均遭到澳葡政府拒絕，令事態急速升溫。在

17 João de Pina Cabra, Nelson Lourenço 著，陳潔瑩譯，《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5），頁 63-66。

「一二・三事件」當日的 12 月 3 日星期六，學校假期，師生如常前往澳督府沿路唱紅歌遊行，期間傳出學生及記者被打的消息，引發大量華人前往澳門總督府聲援。消防局水車及警察防暴部隊被派往驅散群眾，衝突一發不可收拾。示威隊伍從南灣總督府一路前往新馬路的市政廳，沿途政府機構、葡人車輛以及具有殖民地象徵的雕塑遭到破壞，甚至有公職人員被毆打，當中位於南灣法院對出雕塑，首位海路來華的航海家〈歐維士〉手臂被打斷；美士基打上校銅像的配劍首先被示威者拔下（圖 7），其後由多輛貨車拉倒並掉進內港碼頭海中；[18] 衝入市政廳的示威者更把澳門檔案文件撕毀，檔案室遭到嚴重破壞，家具窗簾、總督油畫肖像等拋往窗外的議事亭前地，幸好歷史學者文德泉神父（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1912-2003）在戒嚴期間仍不顧自身安危，努力拯救了部分珍貴的檔案。衝突發生後，澳葡政府於同日傍晚宣佈戒嚴，並表示接受校方的 5 項訴求，可是戒嚴令卻爲城市帶來更多的傷亡。情緒高漲的民眾仍然在新馬路聚集，軍隊使用荷槍實彈實施鎮壓，數日內造成至少 8 人死亡及 200 多人受傷，無論華洋民眾及軍警內部都出現分歧及恐慌，在商業上本地華人進行不合作運動罷賣糧食予葡人，事件中支持示威者的中國更出動 8 艘解放軍圍堵並瞄準澳門，陸路邊境的珠海更結集陸軍部隊以及數千上萬的紅衛兵。事件最終在糧食封鎖以及軍事壓力下，迫使澳葡政府在 1967 年 1 月 29 日簽署答覆書投降妥協，並對事件中死傷者家屬賠償並致歉；對肇事陸軍司令，警察廳兩名廳長

18　李孝智著，丘延亮編，《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 年代的反殖鬥爭》，頁 123。

及代理海島市政局局長撤職查辦，以現金賠償 2,058,424 澳門元同時釋放被捕者。

由於事件令澳葡政府的管治失去威信和實權，社會停擺導致生產力逐漸下降，經濟下行，葡方甚至更一度向北京提出歸還澳門的建議，但於冷戰期間被國際孤立並實施禁運的中共政府，希望在長期發展充分利用原則下，透過澳門成爲中國資金、政治經濟的對外門戶，[19] 另外在香港問題等多重內外因素下，中國拒絕以殖民地原則接收澳門，近半世紀澳門處於託管的狀態，導致殖民政府在社會發展上欠缺積極性，大量中產及精英土生葡人選擇離開澳門，人才流失導致發展於停留狀態，澳門維持數年的火紅年代最終在北京喊停下結束。

冷戰後出現的嶄新意識形態，影響全球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擴張、去殖民化進程、現代化的推進等，使得殖民主義變得更爲錯綜複雜。在歷史上多地亦曾發生民眾對象徵性權力的否定，數年前在美國因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裔嫌犯喬治．佛洛依德死亡，觸發了歐美多地反種族歧視運動，許多與殖民和奴隸販賣歷史相關的人物雕塑被推倒，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哥倫布雕塑、英國倫敦的非洲兵團軍官科爾斯敦雕塑等；[20] 另外在 90 年代初年蘇聯解體後，大量象征蘇聯共產主義的列寧雕塑遭拆除，這不僅反映出權力結構的轉變，更體現了人們對歷史的重新審視，以及對社會理想的追尋。

---

19 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 著，《葡中接觸五百年》，頁 155-156。

20 〈美國「哥倫布日」與「原住民日」並列西方殖民歷史的反思潮〉，英國廣播公司，2021.10.20 更新，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898398。

葡萄牙政府在 40 年代於澳門豎立的兩座被葡方讚譽的英雄雕塑，藉此喚起昔日帝國的榮耀，增加屬民的認同感以及彰顯殖民者的威權，但紀念物的建造卻忽略了雕塑背后的種族衝突。「一二．三事件」反映出澳門在國家權力爭奪之間的妥協，兩位紀念雕塑的豎立及拆遷，隨權力關係的改變而發生，殖民者所建立的歷史敘事遭到推翻，象徵了澳門華人對殖民歷史、文化認同的覺醒，在本土意識上地景的消失無疑令在地者失去集體記憶，在國家意識上卻彰顯了政治的權力。一段被刻意遺忘的殖民地時代歷史記憶，簡化了兩國曾經的政治角力中歷史複雜性，遮蔽了葡萄牙的殖民擴張以及晚清的衰弱，澳門的歷史書寫以及身份認同就如文中雕塑命運，一直由外部介入與他者代替其聲音，使澳門逐漸遺忘了長久以來的妥協以及多重的文化身份，在本土流失的危機中，重構在地敘事話語更爲迫切。反觀澳門在中國愛國主義及葡萄牙殖民主義多重意義下，歷史敘事變得複雜多變，假如集體記憶過於單一化、概括化，找尋自我身份與屬民歷史變得更具困難，就如英裔牙買加學者霍爾（Stuart Mall）（1932-2014）所指：[21]

> 文化認同是由歷史文化語境所形塑的，其定義並不穩定，沒有基本不變的事物。只有因立場變化而變的東西，因此，認同的政治、立場的政治始終存在、而不存在確定無疑的定律。

21　黎熙元，〈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頁 18。

三、城市景觀的記憶選擇

> 城市景觀是一種書寫於空間而且永恆不變的政治傳單，這種景觀是權力實踐的一環。
>
> 鄧肯（Duncan）[22]

城市景觀的規劃反映出管治者的心思，同時體現其社會權力策略，藉此逐漸地對當地民眾產生影響，紀念碑往往被賦予美學詮釋的作用成爲城市的裝飾物，在管治者角度是記憶及政治意識形態的構建。

（一）紀念物與政治——澳門開埠 400 周年紀念

1955 年葡萄牙爲紀念慶祝抵達澳門 400 週年，分別在里斯本及澳門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包括展覽出版音樂會、研討會、授勳、並新建紀念物於馬交石砲臺附近，建造宏大的紀念碑高 18 米，由三組弧面的水泥結構組成，風格簡潔只有葡萄牙國徽上的盾牌及城堡的符號（圖 8），並原定於城市紀念日開幕，但開幕前 3 天遭到北京抗議並要求 48 小時內拆除，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港督葛量洪及英國駐華大使館代辦表示：[23]

葡萄牙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 400 週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應。他們準備這樣做，不僅會刺激在澳門

22 鄧肯（Duncan），1992：86，轉引自 Joanne P. Sharp 著，《後殖民地理學》，頁 74-78。

23 陳杰，〈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外交博弈及其歷史經驗〉，《統一戰線學研究》1 期（2022 .1）：頁 35。

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

中方藉著港英政府向葡方轉達立場，往後《人民日報》更以措辭嚴厲發表〈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的評論文章，葡方在中方壓力下妥協並倉卒地把紀念物於開幕前炸毀。文德泉神父於 1993 年 7 月 23 日葡文報章 *Gazeta Macaense* 寫道：

> 我想這裏還有葡人曾目睹另一個同類紀念碑像的最後收場，1955 年開始在馬交石砲臺動工，面對著海。基礎已經打好，柱已經有一定高度，目的乃紀念葡人來澳 400 週年。特別從葡萄牙 VIANA DO CASTELO 買來火箭，連火箭佚都一聘請來。我本人亦專程由星加坡來澳參加一個座談會。但毛澤東豎一豎手指就整個沒有了。」[24]

50 年代葡萄牙人慶祝抵達澳門 400 周年興建的紀念物，在新中國民族主義下遭到反對並被迫拆除。權力景觀中紀念物非純粹的美學裝置，更是管治者對集體記憶與意識形態的建構政治工具，殖民與國族的對立體現了兩個共和國邊陲下澳門，其歷史複雜的多重性。

（二）《中葡聯合聲明》與澳門的歷史建構

1987 年的《中葡聯合聲明》確認 1999 年澳門主權移交給中國，葡萄牙人趕在這十多年間爲這座城市書寫記憶，在中葡友好論調下

24 João de Pina Cabra, Nelson Lourenço 著，《颱風之鄉 ── 澳門土生族群動態》，頁 180-181。

建構其國族及民族主義，在回歸前留下光榮的印記。其中位於媽閣廟前的澳門海事博物館是筆者童年的家庭日景點，館內展示澳門參與昔日海上貿易的黃金時代、明朝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葡萄牙的大航海時代、水族館以及漁民生活等澳門相關航海故事；另一座在回歸前一年落成的是澳門博物館，原址在數百年歷史的大砲臺進行改建，展品從中西古文明開始陳列到葡萄牙大航海時代的海上貿易，包括貿易商品、傳教士聖物、佛朗機銃、古代版畫機等，以及澳門民間傳統習俗，內容都與中國國族歷史進行連繫，葡萄牙政府在政權移交前，希望在澳門建立他們所書寫的歷史，並積極地淡化殖民時期的衝突矛盾以及有損兩國友誼的歷史，[25] 以雙方友好的敘事下建立記憶的工程，旨在政權移交後延續其文化的的影響力。

本文通過政治角力下的澳門雕塑紀念物進行地方研究，嘗試透過歷史敘述分析地方的構成，研究聚焦於紀念物所承載的殖民與後殖民話語博弈，在邊陲中進行書寫記錄以保存屬民記憶，並對澳門身份認同進行重構。藝術評論家李柏德（Lucy Lippard）（1937-）在她的《地域的誘惑》一書中描述地方是思想、記憶、事物所凝聚構成，地方並不是永恆有界限，而是改變與開放，是一種社會建構產物及各部分鬥爭的政治結果，地方同時產生歸屬感，超越了空間的概念，超越了科學地理的局限，更是一種文化特徵，具有情感依附，表明了我們來自哪裏，背後隱藏了身份，族群等的認同，地方讓我們找回所失去的記憶，忘卻孤獨冷漠。[26] 透過這兩件雕塑的故

25 李孝智著，丘延亮編，《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頁 227-228。

26 Tim Cresswe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 140-141。

事，不僅敘述了近代澳門的發展，更反映殖民時代下澳門社會的文化建構，以及政治經濟權力的運作。然而，在不穩定的政治權力結構中，長期由外界對其進行歷史表述和記憶的篩選，阻礙了歷史的敘事及文化身份的認同，屬民聲音更難以被聽見，導致本地歷史敘述變得失去主體與斷層化，造成澳門本土文化出現表述危機。

在「一二．三事件」後，國族主義盛行加速了推翻了殖民主義所建立的文化認同，紀念物〈亞馬留紀念銅像〉及〈美士基打銅像〉喚起了葡萄牙帝國的榮耀記憶，另一方面卻隱喻了清政府的潰敗及妥協，雕塑成爲了兩國殖民主義與國家主權的記憶政治角力場所，雕塑的拆遷象徵了權力的轉變，屬民仿佛需要重新學習並重構過去的歷史記憶，甚至否定自身的經驗。在這缺乏自主性的文化建構過程中，身份認同難以建立，阻礙地方歸屬感的培養，城市更可能面臨只迎合觀光產業而逐漸的「迪士尼化」，或僅成爲人口移動的工具城市，地方文化歷史脈絡遭到忽視，使得地方失去意義。在殖民主義落幕後澳門政權移交中國，承諾 50 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已實施近 26 年，在國家建構與地方性保存之間，澳門的未來與文化身份又面臨怎樣的轉變？澳門在數百年間由文化、權力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及妥協中交織而成，構建出多重獨特的文化特徵。透過正視歷史，反思過去與書寫屬民記憶，促使我們對自身城市有更深層的理解，更爲社會的未來提供參考的依據，有助維繫這城市文化特徵並促進社會的多元性。

圖　版：



圖 1　位於澳門南灣的〈亞馬留總督銅像〉，1980，黃生攝。
圖片來源：http://www.1844macau.art/store/products/tong-ma-ii-monumento-a-ferreira-do-amaral-the-bronze-horse-ii-1992。



圖 2　里斯本 Bairro da Encarnacao 社區花園中〈亞馬留總督銅像〉。
圖片來源：2016 年筆者攝於葡萄牙。



圖 3　1890 年澳門關閘。
圖片來源：https://www.macaumuseum.gov.mo/%28X%281%29S%28mgost23ud50n1tcxfctmq1x1%29%29/collections/95356?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圖 4　阿爾維斯，〈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紀念碑〉，石雕，1931。
圖片來源：2024 年筆者攝於葡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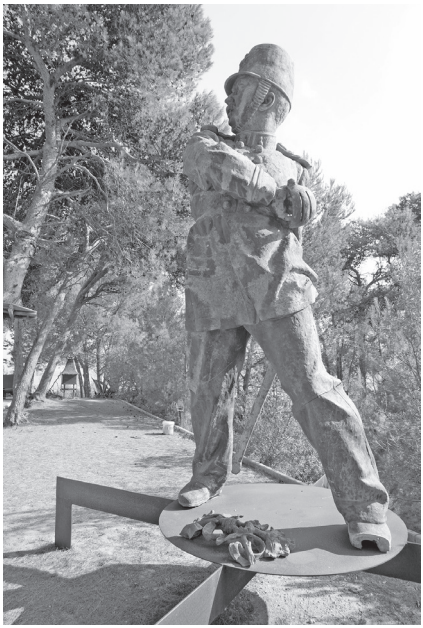


圖 5　阿爾維斯，〈美士基打上校銅像〉，銅，約高 260 cm，1940。
圖片來源：2024 年筆者攝於葡萄牙。



圖 6　澳門「一二・三事件」舉行的遊行大會。
圖片來源：〈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澳門日報》（1967.9.1）。



圖 7　議事亭前地的〈美士基打上校銅像〉在「一二・三事件」被民眾拉倒，1966。

圖片來源：https://chiculture.org.hk/tc/photo-story/3902。



圖 8　準備炸毀的澳門開埠 400 周年紀念物，1955，Forman, Harrison 攝。

圖片來源：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collection/agsphoto/id/27008/rec/13。

參考書目

（一）中文論著

Cabra, João de Pina, Nelson Lourenço 著，陳潔瑩譯，《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5。

Cresswel, Tim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Le Goff, Jacques 著，方仁杰、倪復生譯，《歷史與記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Miranda, Maira Adelaide 著，陳用儀、姚越秀譯，《葡萄牙美術史》，北京市：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

Oliveira, Fernando Correia de 著，楊立民、王燕平譯，《葡中接觸五百年》，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基金會，1999。

Sharp, Joanne P. 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理學》，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12。

Silva, Beatriz Basto da 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19 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何志輝，〈明清時代澳門的中葡共治研究〉，博士論文，關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科，2014。

李孝智，丘廷亮編，《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7。

陳杰，〈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外交博弈及其歷史經驗〉，《統一戰線學研究》第 1 期（2022.1）：頁 28-38。

鄭培凱、李磷，《文化遺產與集體記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黎熙元，〈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92 期（2005.12）：頁 16-27。

（二）西文論著

Mourao, Alda, “O Governador Ferreira do Amaral e Zhiliang Uma reflexão sobre heróis criados em Macau, a partir de experiência pedagógica com alunos chineses,” *Orientes do Português*, no.3 (2021): pp.81-103.

Pinto, Ana Lourenço, “The Portuguese Neo-Baroque Sculpture: state of the art,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adernos de Arte Pública* 2, no.1 (2014): pp. 24-35.

（二）網路資料

〈美國「哥倫布日」與「原住民日」並列西方殖民歷史的反思潮〉，英國廣播公司，2021.10.20 更新，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898398。